



岭南博士文库

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

杨敬宇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杨敬宇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10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博士文库

ISBN 7-218-05268-1

I. 清… II. 杨… III. 粤语-语法-研究-清后期
IV. H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398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1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5268-1/H·121
定 价	3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s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s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中文摘要

利用文献资料研究粤方言的历史，是汉语方言语法一个新的和迫切的研究方向。粤方言保存有一定种类和数量的清代历史文献，包括学话课本、圣经文本、木鱼书、粤讴和俗话作品等，为历时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目前粤方言历时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方面，语法由于变化细微，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书首次利用清末粤方言学话课本《粤语全书》，并结合《粤音指南》和《*Cantonese Made Easy*》两本不同性质的学话课本，参考《新约》、《俗话倾谈》、《新粤讴》和《金丝蝴蝶》等各种类型的清末语料，在系统普查的基础上，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描写清末粤方言的词类和句式，归纳语法的类型特征，确定书面语料所归纳语法内容的性质，并与当代广州方言进行比较，获取百年来的变化点，考察发展的内部机制。

清末语法描写利用语文方法和比较方法。比较包括同质材料的对比和异质材料的对比两类。同质材料对比指进行比较的语料都属于学话课本，多本教材综合可以印证和充实《粤语全书》得出的语法内容。异质材料对比是指与学话课本以外的语料进行比较，通过异质比较，确定同质对比中抽象出来的广州方言语法性质是以广州方言口语为基础的标准语语法。



研究结论如下:

一、清末共时语法描写。根据以《粤语全书》为主的学话课本,对比其他类型的参考材料,描写清末书面记载广州方言中存在变化点的十四个语法单元,词类方面包括量词、方位处所词后附成分、代词、表可能的助动词和词尾、副词、表动向和结果的后补成分、动词体貌成分和句末助词,句式方面包括比较句、给予句、处置句、被动句、否定句以及正反、是非和选择三种疑问句。

二、清末与当代广州方言语法比较。在清末粤方言语法材料的基础上研究历时演变,出现的变化主要包括几种类型:

(1) 与书面记录因素相关的变化,例如量词“样”、“回”和“个”使用减少,“俾”发展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被动句标记,“被”的使用消失等;

(2) 某些语法成分发生替换,例如疑问代词从“边”和“乜”竞争发展为今天“乜”的用法被削弱,表示完成的动态后助成分“晓”完全消失,由“咁”取代等;

(3) 某些语法成分消失,例如给予句“俾+N_物+过+N_人”是清末的主流形式,今天以双宾语形式“俾/V+N_物+N_人”为主,“过”基本消失,可以引出处置对象的“搵”不再使用等;

(4) 受到共同语影响而发生的同化,例如“V下”之外出现动词重叠表短时、随意的用法,出现“比”字句等;

(5) 句型发生类型变化,主要是指正反疑问句中宾语和补语等补足成分转而出现在否定形式之后。

本书还尝试从“语法文白”的角度考察广州方言的发展机制,也对“方言发展向共同语靠拢”观点提出疑问。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与广州方言的“后置”特征有密切关系。共同语受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不断影响,语法体系已经在类型上偏离了中古时期的汉语,介词结构的位置从动宾



结构之后向动词前转移，而广州方言语法仍存在丰富的“后置”特征。清末共时研究和百年历时研究都表明，“后置”传统自中古后就一直控制粤方言的发展方向，使方言特色越来越突出，这种控制能力在近现代与共同语亲密接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削弱。在后置系统这个主流体系上，百年来的变化形成自主的发展路线；共同语虽然对前置系统有所影响，但是由它引入的表达方式都以重合式为主，只是丰富了表达，没有动摇或者改变广州方言固有的语法体系。“后置”是广州方言历时发展的根本机制。

【关键词】粤方言 历时演变 清末 语法文白



Abstract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the Yue dialects based on written materials is a new issue in the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The well-preserved written materials of the Yue dialects from Qing Dynasty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ost of the works on the Yue dialects now are on pronunciation and lexicon. The part of grammar is neglected since the changes are not so distinguished.

In this dissertation, as a whole new written material, a textbook *Yueyu Quanshu*, was applied in the study of the Yue dialec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textbooks, *Yueyin Zhinan* and *Cantonese Made Easy*, and other types of written materials, such as the *Bible*, *Muyu*, *Yue'ou* and *Suhua*, the grammar of the standard Yue dialect, Canto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described. After the description, this grammar system was compared with the modern Cantonese to find the changes happened during a hundred years.

Two comparative ways were applied to describe the grammar of Canto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one was to compare the materials of the same quality, which were all textbooks. The second was to compare the textbooks with the other



four materials of different qualit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grammar system concluded from the textbooks was the standard grammar based on the oral Cantones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grammar of Canto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urteen parts of grammar were described, including the measure words, the location component, pronouns, helping words, adverb, verb auxiliaries, comparative sentence, giving sentence, dispositional sentence, passive sentence, negative sentence and question sentence.

2. The changes of Cantonese grammar during a hundred years. In the fourteen parts of grammar described above, 5 types of changes were found and expl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a dialect is influenced by two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One is the literal factor, which come from Mandarin. The other is an oral one, which will make the dialect develop independently. In the grammar system of Cantonese, the prepositional components manifest the literal influences, while the large amounts of postpositional components belong to the oral, local factors. Postposition is the basic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mmar of Cantonese. Several new prepositional expressions from Mandarin had no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local postpositional system, which means Cantonese is not really moving toward Mandarin. As long as the postpositional system remains the base of the Cantonese grammar system, Cantonese will keep distance with Mandarin.

Key words: the Yue dialects (Cantonese), historical changes,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teral-oral grammar



目 录

引言	1
一、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	1
二、粤方言语法历时研究的条件	4
三、本书使用文献的版本	8
四、本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16
第一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 (一)	23
第一节 量词	23
第二节 代词	29
第三节 副词	36
第四节 句末助词	40
第二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 (二)	49
第一节 方所词	49
第二节 表可能的动词词尾和助动词	55
第三节 动词后补成分	61
第四节 动词体貌成分	73
第三章 清末广州方言语法 (三)	80
第一节 介词与前置修饰	80
第二节 否定句	83



第三节	比较句·····	89
第四节	给予句——兼谈双宾语和使役 ·····	94
第五节	处置句·····	101
第六节	被动句·····	106
第七节	疑问句·····	109
第四章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语法发展专题·····	114
第一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词类变化·····	115
第二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句式变化·····	125
第三节	广州方言语法发展总论·····	128
第四节	成分替代：“晓”和“咀”·····	132
第五节	成分消失：给予和处置·····	137
第六节	吸收和调整：“可以”和“能” ·····	142
第七节	类型变化：正反疑问句·····	146
结论 ·····		151
第一节	清末以来广州方言语法演变小结 ·····	151
第二节	方言研究中的“语法文白”思路 ·····	154
第三节	方言向共同语靠拢? ·····	161
参考文献 ·····		166
附录一	本书所使用的现代广州方言标音系统 ·····	186
附录二	《粤语全书》例句·····	188
后记 ·····		224



引言

一、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在方言学和汉语语法学两方面都面临着传统弱势：重音韵、训诂的学术传统使方言研究的重点一直在语音和词汇上；而汉语语法研究多着眼共同语，方言语法不是主流，缺乏充分发展的机会。

随着语法调查研究的深入，方言语法的差异渐渐凸现，方言语法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作用也开始受到重视。但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受到方言调查基本次序、记录和方法的制约，很难通过几次调查就把相对抽象的语法规律概括得非常全面，加大了调查研究的难度^①。早期介绍方言语法特点的文章以词法现象为主，句法特点为辅，一般只介绍与普通话相异的句法结构，描写简单，举例少，依附于普通话语法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有论文在论述过程中对方言现象进行细分类，描述方言语法特点的时候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细致深入，并在详细描写的基础上着手挖掘规律性的东西，普通话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与普通话的比附也

^① 参见汪国胜《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以及谢自立《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综述》，《方言》2001 年第 4 期。



减少了。这体现出“系统观”开始进入方言的语法研究，方言本身成为描写的主体^①。有了“系统观”指导下的全面描写，对方言语法现象的观察就变得更敏锐，研究也越来越细致。

系统地描写某一方言的语法现象是研究方言语法的基石，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汉语方言不断开拓新的方法和内容，例如比较研究、类型学研究、话题研究以及与普通话、近代汉语的结合等。历时研究正是其中深化方言语法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利用活的语料构拟方言语法的历史^②。在构拟的研究过程中，词汇扩散理论的运用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词汇扩散理论最早由王士元在1969年提出，在语音变化的解释方面取得瞩目成绩，语法领域也开始运用这一理论，包括方言语法。由于方言地域分布的连续性差异蕴涵时间差异，使利用词汇扩散理论寻求对语法变化过程的解释成为可能。不过，目前用词汇扩散理论解决方言语法问题的成果较少，主要是海外学者在大力推广，如郑良伟和余霭芹^③等。词汇扩散理论不仅在运用方言材料解释语言演变的漫长历程方

① 方言成为描写主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方言的语法特点不再用“猎奇”的眼光来描述：“方言语法无论跟官话同还是不同，都是‘特点’，都有意义。譬如，以A为设定的语法项目，则两个方言之间的同异表现为三种情况：（1）相同；（2）不同；（3）不相关，即其中一个方言根本不存在这个项目。”〔项梦冰：《大陆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②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徐丹：《从北京话“V着”与西北方言“V的”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方言》1995年第4期。

③ 郑良伟：《词汇扩散理论在句法变化里的应用——兼谈台湾官话“有”字句的句法变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1期。余霭芹：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3年第2期。



面有相当的实力，而且为方言语法研究中如何整理一些零散的小方言点的差异材料提供观察角度。此外，词汇扩散理论的研究发现语法演变时词汇的扩散过程与词项的使用频率有关，高频词的使用更具有典型意义，配合量化研究的新趋势，提示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有侧重地考察一些具体词汇的运用。

第二种类型是利用文献资料展示方言历史。这是所有研究里最缺乏的一环，因为与浩如烟海的文言史料及不断挖掘出的共同语白话史料相比，方言史料的基础非常薄弱。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材料利用比较零散，考察某个方言问题时，有的是使用共同语的文献资料^①，有的是使用有方言特色的文献^②，个别进行了专书的方言历时语法成分分析^③。

总的来看，方言语法的历时研究利用共时材料的时候多，利用历史材料的情况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根本是解决史料来源的问题。目前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方言语法研究工作已经有所展开，但各个方言区之间的研究力度相当不平衡。吴方言方面显示出较强的实力，比如在日本出版了历时语料的参考集《吴语读本——明清吴语和现代苏州方言》（石汝杰，东京好文出版 1996 年版），在方言历史研究的专著中专章讲述方言历史语法（《上海语言发展史》第四章，钱乃荣，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还有一定数

① 李崇兴：《湖北宜都方言助词“在”的用法和来源》，《方言》1996 年第 1 期。

② 徐复岭：《山东方言比较句式溯源简说》，《中国语文》1995 年第 2 期。

③ 胡明扬：《上海话一百年来若干变化》，《中国语文》1978 年第 3 期；钱乃荣：《〈肉蒲团〉、〈绣榻野史〉、〈浪史奇观〉三书中的吴语》，《语言研究》1994 年第 1 期；石汝杰：《明清小说和吴语的历史语法》，《语言研究》1995 年第 2 期等。



量的专门讨论方言历时语法及相关语料的论文。这些成果的出现与吴方言本身保有大量的历史教材、文学作品和圣经等文献不无关系。此外，山东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在此类方言语法历时研究上也做了一定的工作。

二、粤方言语法历时研究的条件

余霭芹曾经提出粤语研究的几个迫切任务，“历史研究”是其中之一。她所指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上述第二种类型，利用文献资料研究一些粤方言的课题，她本人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地利用 19 世纪的资料研究粤语的历史。她认为：“粤语方言的资料，虽然没有闽南话或者吴语那么丰富，但是，至少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些资料绝大部分涉及广州话。……这些资料，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只要使用得当便是了。到现在为止，利用这类资料来进行研究的，还寥寥可数，大有可发展的天地；对粤语语法的历史研究，尤其有启发性。”^①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粤语语音、词汇方面的历时研究较多，语法方面还不多见。不过，诚如余文所言，粤方言也拥有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历史文献，为历时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经过初步了解，以粤方言写就的清代文献主要有学话课本、圣经、木鱼书、粤讴等几类。这些以粤方言为基础写成的文本^②，语言形式各不相同，从不同角度、最大限度

① 余霭芹：《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 年第 1 期，第 21 页。

②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粤方言词典，只是旧式的词典鲜少例句，作用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汇研究上。本书以讨论语法现象为主，故在此不加论述。



地为清末粤方言的语法研究提供了材料。

(一) 学话课本

最早的粤语学话课本是由外国人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编制，供到粤传教的传教士学习“标准”的粤语，课本主要在广州和香港出版。之后也陆续有中国人编写一些粤语课本，在全国发行，一般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

西人和国人编写的学话课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标音和注释。西人编写的课本一般有比较清晰的语音标注和细致的语用、语法说明，有的作者还体现出相当高的语言学素养，运用音标非常细致到位。国人的课本则多是纯文字版本，极个别情况下，比如变调的时候标注一下平上去入的读音，一般语音上的变化只能由字形上的差别体现。西人课本一般都有外文注释和语法上的归纳讲解，国人课本则只有课文（例句）内容。

世界多处图书馆收藏有广州话的学话课本。在研究学者的热心收集整理下，目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西人编撰的学话课本种类已经不少，比如余霭芹提供的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1842)、《散语四十章》(1877)、*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7)、*Progressive and Idiomatic Sentence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1888)、*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1894)、*Beginning Cantonese* (1906) 等^①；在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 *Phrase usuaes dos dialectos de Cantao e Peking*（葡萄牙语）、*Cantonese for everyone* 和 *Cantonese Made Easy* 等；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的 *How to Speak Cantonese* 等。

相比之下，国人编纂的粤语课本较少，仅有《粤音指

^① 余霭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读〈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南》和《粤语全书》等几种。

(二) 圣经

《圣经》是世界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据调查，“汉语方言《圣经》（不包括文理本和各种官话本）共有 600 多种……所涉及的方言包括吴、闽、粤、客、赣五大类”^①。其中粤语的版本，据圣公会关于圣经历史版本的记载，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比较常见的粤方言《圣经》以当时的粤语口语记录。不同的教会写定的版本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有共同的翻译底本，彼此之间出入不大。除了全本的《圣经》，还有一些例如福音书等的单行本。不少图书馆都收藏有粤语《圣经》以及相关的宗教读本。

(三) 木鱼书

在所有以粤方言写作的文献资料中，木鱼书的数量最为丰富。

“木鱼歌”是用广州方言演唱的说唱形式，又称为南音与龙舟^②，木鱼书是木鱼歌的唱本。木鱼歌在明代已流行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清代至民国初年最为兴盛。据史籍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已出现木鱼书的木刻本。

木鱼书的刊本、抄本很多，自明、清至民国初年，有记载可查的约 500 部，四五千卷之多，内容多样。木鱼书的句式有韵文特点，七言带韵，偶有变化。印刷起来，一行四句，空间是固定了的，如果要加字，则以小字双行的写法，比如九言就是前四字缩小为双行，十一言就是前六字缩小为双行，如果仅四言或六言也同样占据七言的位置，这样的木鱼书看起来相当整齐，也便于

①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调查报告》，《东方语言与文化》2002 年第 1 期，第 264—281 页。

② 目前研究者对于“木鱼”、“南音”和“龙舟”几个名称所指的具体项目还有一定的分歧，从出版的具体作品的名称看，三者其实是有交叉的。



百姓阅读、吟唱。

虽然木鱼书的数量丰富，但是由于出版等原因，一般无法从原书上看到作品创作年代或者出版印刷的时间，保留下来的只有出版商的名号，因此在木鱼书的年代考证上存有诸多问题。广州、佛山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均收藏了相当数量的木鱼书。

（四）粤讴

“粤讴”是一种广东民间音乐曲艺，一般认为是广东南海县人招子庸始创于清嘉庆末年（约为19世纪20年代）。当时广州一带流行的方言民歌是词句比较俚俗的咸水歌和叹情，从北方传入了高雅的子弟书后，招子庸将几种民间文学形式融合在一起，各取所长，创作出了粤讴这种运用粤语方言、篇幅句法长短随意、有韵而不限格律的新民歌。第一本粤讴出版于1828年，共121首作品，内容多与妓女的不幸生活有关，也有不少篇目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离情别恨的。

粤讴出现后，广东人一时追捧，多人仿作，清末民初还出版了一些新的粤讴集子，形式上没有更多的创新，但是内容有所扩展。招子庸的《粤讴》在不同年代有多个刻本，80年代更有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比较容易寻获；反倒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新创粤讴，只能在图书馆里见到刻本。

（五）其他

除了以上四大类常见的、典型的粤方言文本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说书、说唱、讲解的作品，这方面的文献还在不断地发掘中，笔者已知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 俗话作品

说起广州方言的俗话作品，最著名的是《俗话倾谈》一书。《俗话倾谈》作者邵彬儒，字纪棠，广东四会县荔枝园人，以说书为业，在家乡及广州、佛山、香山（今



中山市)一带演出,轰动一时。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说书艺人,邵彬儒的故事几乎都是清代同治年间社会中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最基本的道德伦常和处世之道。从语言特色来看,全书以广东方言为主,语言质朴流畅,是典型的说书人的风格。作者考虑到了作品的听众和读者较低的文化层次,所以以俗情俗语达到令听者喜闻乐见的目的。

2. 直解作品

清代常有人对一些较艰深和重要的文言书借用白话加以阐释,比如官话方面的《广训直解》等。粤语也有直解作品,目前有介绍的是《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这本书以广州俗话翻译兼解释《书经》。全书包括序文一页,正文五卷185页。……与同时代白话资料比较,俗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虽限于行政、军事之类,但篇幅可观”^①。

3. 说唱作品

在《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②里,收录了一出由新广东武生创作的地方戏《黄萧养回头》,在常见的戏曲格式和语言之外,大量运用广州方言。该丛抄里其他一些以“广东”为名的作者的作品里,虽然没有丰富的广州方言,但也使用了一些属于粤方言的语气词,可以对语气词研究提供一定的语料。

三、本书使用文献的版本

本文使用的文献分为三类。一类是学话课本,是研究主要使用的基础文献,因为在所有文献中,它们能够最大

^① 余霭芹:《粤语方言的历史研究——读〈麦仕治广州俗话〈书经〉解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第497页。

^② 阿英编,中华书局1960年版。